

“我出生在这里，结婚在这里，
孩子出生也在这里”

庆安会馆 的“后人”回来了！

“我出生在这里，结婚在这里，孩子出生也在这里。”
“小时候，看到大人开会最开心，因为那天的菜肯定特别好。”

6月14日，恰逢今年的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，正在修缮中的“世界文化遗产”宁波庆安会馆迎来了一批特殊的造访者——他们都是庆安会馆的“历史使用人”，有会馆创始人的后人、“嫁”到会馆来的媳妇，也有在木行路小学读过书的学生。

响应此前“全城搜寻庆安记忆”活动，他们在这特殊的日子“回”到庆安会馆，看着熟悉的飞檐黛瓦马头墙，分享独家记忆。



庆安会馆“后人”费家夫妇回到他们居住过的房间。 记者 顾嘉懿 摄

1 庆安会馆办过庆安小学

今年86岁的费家先生是当天最“重磅”的一位客人。他是庆安会馆创始人之一费纶金之后，从小居住在庆安会馆东北角的费宅。

“这是庆安会馆的附属用房，我出生在一层，结婚后搬到二楼最南边的一间。一直到2000年，我儿子才搬出这里。”故地重游，费家颇多感慨，“我们老家在庄桥的费市，为了处理庆安会馆事务方便，祖上在这里住下，一代代传下来。”

费纶金之后，二代费曼书、三代费崇高、四代费慈年、五代费闵渠，传到费家已是第六代。

“庆安会馆有好几位发起人，到我太公费崇高的时候，他成了这个会馆的实际掌控者，他的房间在费宅一层最南面的一间。”在费家的印象中，费崇高不完全是一个管理船运事务的商人，更是一个热爱文化和教育事业的文人。他在老家费市有一座藏书楼，名“小沧桑馆”，为中西合璧的洋楼建筑。后来费崇高将其捐作“蒙春小学”，又变成费市小学、中学。如今洋房面貌

大改，实有“沧桑”之感。

费家回忆，他小时候居住的费宅，一层住人，二层储物，二楼正厅间大部分都是线装书，说是老宅放不下搬来的。

费崇高喜欢搞教育，除了在老家捐了个小学，在庆安会馆也办了个小学，就叫“庆安小学”，费家兄弟姐妹六人都是在庆安小学念的书，姑姑黄鞠想还做了这里的老师。

“据说我太公觉得庆安会馆房子多，空着也没用，加上他自己喜欢办学校。我小时候，两边的厢房都是教室，上面一个教室，下面一个教室，一共8个班，每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。”

因为厢房都是狭长形的，严格来说做教室并不好，“后排学生会看不清黑板”。费家回忆。但自家办学的好处是方便，从他家里到教室花不了两分钟，“我们小时候一般听到上课铃响了才出门，从写着‘北号公所’的后门进入，跑进去就是教室，而且一路不会淋雨，都是连廊，我们小时候是没有雨靴的，会馆就是我们天堂……”

2 “弃商从文”的费氏家族

费崇高没有放弃过培养后代。他有两个儿子，但都英年早逝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他就转而培养孙子，也就是费家的父亲费闵渠。

费家听长辈讲过一个故事，在费闵渠14岁的时候，费崇高希望他可以跟宁波总商会会长、上海四明银行董事俞佐廷学做生意。“在一个隆冬雪天，年纪已长的费崇高到宁波火车站去等俞佐廷，俞佐廷不知道是什么事让费崇高冒雪等待，听说是拜师，非常感慨。”

就这样费闵渠去了上海。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，喜欢写字、画画、玩乐器。费家小时候，家里的正屋挂满乐器，包括二胡、琵琶等。读小学的费家有次说，“我也要学胡琴”，父亲二话不说就给他买了一把新的。

费闵渠一共有6个孩子，养家压力大。在上海，他一边做四明银行的文书工作，一边跟近代医

家罗哲初学中医针灸，平时会给金店的钳工看伤。后来上海成立“金融医院”，正中费闵渠下怀。费家记得，大概是在1954年，父亲知道自己可以去当医生特别高兴，“那个是他真正喜欢的。”

费闵渠还在上海认识了今虞琴社的吴振平先生，研习古琴。

今天的费家是我市知名琴人，家中有把超过500年的明琴，惹人艳羡。费家表示，他弹古琴的爱好承自父亲。“以前大户人家有‘左琴右书’的说法，我家这把琴不知道是哪辈传下，一直挂在父亲书房里，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。”

“我们家后来就很像文人家庭，不像商人家庭。”费家说，他的母亲叫王定娟，出身湖西人家，也从小读书，不缠脚。家里要供6个孩子读书，母亲把她的金银首饰都卖光，但就是不动那些书画。

3 做过木行路小学的校办工厂

庆安会馆开启记忆征集以来，收到了20余张老照片。其中一部分为曾参与2000年修缮工程指导工作，现就职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殷芳提供，拍摄于2000年前后。

几张照片中，还能看出庆安会馆大殿前，曾是木行路小学操场的样子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庆安小学改成了木行路小学。

据现有材料推测，庆安会馆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过火灾，除了宫门和大殿外，仪门和前戏台的部分被毁。木行路小学将这部分改作操场，添置了一些体育设施。

鄞州区第二医院骨科医生吕亮就曾是木行路小学的学生，当天他也回到了现场。

“我1984年到1987年在这里读书，一年级读到四年级，后来转学了，转学前在‘校门口’也就是今天的大殿前的龙柱旁拍了几张照片，这次被征集到了。”

吕亮回忆，他那个时候教学楼建在庆安会馆的北面，呈Z字形，跟会馆中间有一条50米的煤渣跑道。会馆里的二楼厢房当时是校办工厂，生产本子5分钱一本，还生产飞行棋、斗兽棋；后戏台则用作仓库，还办了学前班。

“操场上体育课，我们在这里跳绳、打球，还有练体操的爬梯，星期一升旗也在这里。如果是下雨天，我们就在会馆里面上体育课。”吕亮记得小时候调皮，在会馆里玩捉迷藏，藏着藏着就睡着了，等下课铃一响，拎上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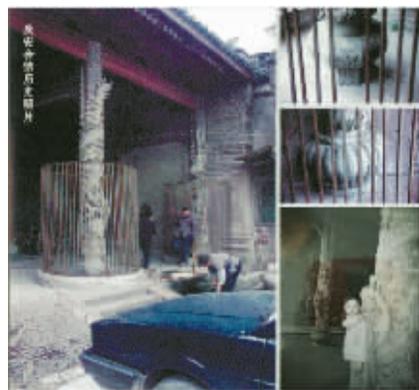
包回家，“小时候就这么过的。”

在他童年记忆中，庆安会馆的大殿没有灯，只有天然光线，上面的朱金漆闪闪发光的，木雕、龙柱经过百余年风霜依然保存得很好，他小时候“不懂”，但也有很深的印象。

当天，回到庆安会馆的还有费家的夫人蔡惠娟，她是1967年“嫁进会馆”的媳妇，她的两个孩子都在这里出生。她记得当时家里进出都走东侧的月门，迎面就是“北号公所”的砖匾。她和家人在这门下乘凉，度过四十载人生。

庆安会馆修缮工程负责人表示，这些珍贵的记忆场景，对庆安会馆价值传承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方面在物质载体层面，摸清了庆安会馆各个时期的历史格局、功能流线、使用状况，还原了相应时期的真实历史场景，链接了当下空间与历史空间。在修缮工程中，他们也会将这些记忆场景保留下来、阐述出来、展现出来，构建物质遗产的精神价值传承。

记者 顾嘉懿



征集到的老照片。